

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

杨颖育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孟子》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被译成西方文字,该书对英语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国内对《孟子》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却明显研究不足。本文对国内有关《孟子》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做了详尽的梳理和全面介绍,总结出国内目前《孟子》英译主要的特点:其一,注重语言学层面的翻译研究,其二,译本研究多为理雅各英译本研究,对其它译本关注不够。因此,多译本流变学研究以及典籍英译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应成为《孟子》英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孟子》英译;国内研究;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32-05

一 研究的缘起

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孟子》在宋代被列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四书”之一,从元代开始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①,尊为儒家正统,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该书被译成拉丁文(1594)、俄语(1771)、法语(1824)、英语(1828)、德语(1914)、芬兰语等西方语言以及日语和韩语等亚洲语言,其影响也远播世界各国,不仅对亚洲各国儒家文化的兴起有重要的影响,更对西方各国的哲学、人文、道德、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也至今不衰,美国总统奥巴马^②曾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饶有兴趣地引用孟子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孟子·尽心下》^③,来比喻美中两国的任务就是“要为后代共同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即便在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也不要让这条道路被荒草埋没。”与《孟子》一书深远的影响相比,关于《孟子》如何通过译介影响了英语世界,英语世界又是如何接受和传播《孟子》的研究却非常缺乏。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搜索,1979年至今的三十年里,论述《孟子》英译的期刊文章只有九篇,专论《孟子》英译的硕士论文五篇,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雅各英译《孟子》,偶有提及刘殿爵和赵甄陶等人的译本,其目的主要是为论证译作参照,没有学者对理译以外、多达十几位的其它英译者和英译本进行深入系统的综合研究。现有针对《孟子》英译的研究,主要也停留在对其译文做传统的语言学、语义学层面的探讨,关于译文表象下,译者策略采纳的政治、文化动因,译文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变形、错位、变异等多方面因素却鲜有研究,因

此,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多空白点值得关注。在此,笔者对现有的九篇期刊论文和五篇硕士作具体介绍,以管窥目前国内《孟子》英译研究的现状。

二 《孟子》英译国内研究现状回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杨正典^[2](101-102)]的《英文版〈四书〉译误浅析》,是目前查证的最早一篇涉及《孟子》英译的论文,该文以1898年香港出版(1914年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修订版)的《中西四书》为例,列举了“囿于传统旧说以及对古汉语结构、词性的误解”而出现在英文版《中西四书》中的错误,全文列举译误九处,第一例便出自《孟子·滕文公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作者认为由于句读失误,把问号放在句尾,不符合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原意。应读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④作者认为孟子自称“知言”、“好辩”,他的学说具有严谨的逻辑结构,作者认为这句话的大前提:“人皆可以为尧舜。”(全称判断)小前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肯定判断)结论:“有为者亦若是。”(我也能象尧舜那样成为圣贤)并解释说,“这种疑问句式与问答句式对比,从内涵说是有区别的,从逻辑规则说,前者不能构成肯定判断,从而削弱孟子论证的说服力,因而不符合孟子的原意。”其余八例出自《论语》英译。

秦颖^[3](76-78)]的《英译〈中国经典〉》是一篇为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汉英四书》写的书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硕士秦颖是该社的编辑,文章篇幅较短,分析了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艰辛和理氏的成就,作者认为,“理雅各的译风是学者化的,用六字概括即:冗长、呆板、如实”。作者举了理

收稿日期:2010-04-2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翻译文化研究”(项目编号SCWY08-24)阶段性成果,2009年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四川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颖育(1972-),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与比较文学。

译《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依字直译令人费解的例子,以及《诗经》英译的一个例子,说明理氏“翻译之目的素为忠于原作,而非崇尚文采。”

楚至大^{[4](26-28)}的《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作者认为,“理雅各英译《四书》至今仍是公认的最好版本,但是其译文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原文的理解尚欠深入,只停留在原文的表层结构上,因而译文太直,使外国读者无法充分理解原文的真谛。二是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中国古代的风土人情不够了解,缺乏背景知识,致使译文有误。”并举出理雅各两段《孟子》译文“子欲子之王之善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和“揠苗助长”(《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为例,提出理译欠妥之处,并提出了作者的译法,这篇文章主要局限于个别字、句的讨论,广度及深度上有所欠缺,作者提出,“英译《四书》、《五经》的工作最好能由中国学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既要由一个权威机构出面组织领导,也要有大批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其事。”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中即有赵甄陶等英译的《孟子》,楚至大为其写了前言。

香港中文大学洪涛^{[5](123-125)}在《聊城大学学报》发表《〈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该文集中研讨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英译本,旁及其它译本(如 W.A.C.H.Dobson, David Hinton, James R. Ware, 何祚康、赵甄陶、张文庭、周定之等的译本),文章主要探讨孟子中“仁”“义”、“仁义”、“孝”、“道”、“气”、“博弈”等字义的译法进行比较,还对文化差异,主要是历史人物,如尧、舜、文、武、幽、厉等帝王的译法提出应加注或者表示出 king,该文结论是“要翻译《孟子》,首先必须先了解《孟子》的字义(尤其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孟子》书中的文化词语(cultural-specific terms)有所认识。涉及《孟子》书中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事物,译者面对的不仅是‘词汇空缺’的问题,更要考虑文化隔阂的问题、英语读者理解能力的问题。为免曲解原意,译者有时只能用注释加以补充说明,甚至只能用拼音文字。”这篇论文集集中讨论了《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的字义表达,非常有必要,也很有学术价值。厘清这些概念的字义对正确理解和翻译孟子,正确传播孟子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该文提及《孟子》英译的其它版本和参考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信息。

洪涛^{[6](42-44)}另一篇论文《〈孟子〉辩辞的英译》,对

理雅各和刘殿爵《孟子》译文进行比较,首先讨论了偶句、排句翻译与译文中的省略,重点在句式处理、表达上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理译《孟子》对一些修辞句式进行了改写及省略。例如,对排比句、对偶句进行了适当的省略翻译。造成这种翻译产生的原因是中、英文在组成词组时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汉字是单音节字,便于组成词组,形成句与句的对仗。英语不具备这个条件,平行句式出现的频率较低。文章还从语言的意合现象与译文中的增饰分析了理译《孟子》时增饰逻辑性副词、连词等,使译文在形式上符合英文习惯,得以形合。最后讨论了取譬设喻的翻译,作者“从句式、意合形合现象和譬喻三方面探讨孟子的辩辞的效果,检讨了译者做法及其得失。”结论是“要翻译《孟子》的辩辞,形式上的仿拟是有可能做得到的,而且也不难做到,但是,亦步亦趋的做法并不是最好的做法。译者的实践,说明做汉英翻译有时也要迁就英语的习惯”。此外,在理雅各对《孟子》原文替喻的处理上,文章认为“理译过于直白,不够传神,但是意义恰当。”整篇文章以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译文为主要评论对象,《孟子》的辩辞研究是《孟子》作品文学性的重要体现,限于篇幅全文的讨论不够深入。

陈琳琳^{[7](65-67)}《析论理雅各对〈孟子〉中些许成语典故的翻译》,主要针对理雅各对《孟子》中某些成语典故翻译的不当,做了评价并提出自己的翻译。该文的观点是:“文化差异是造成译文失真的根本原因,理雅各翻译的缺憾之处,大多是由于他对那些成语典故本身理解不透乃至理解错误造成的。除去少数一些误译与翻译不恰当之外,其译作还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另外他的译作严谨,忠实原文,并附有大量注释,信息量足,研究价值高,非常值得译者学习。”这篇论文指出了理译的“察秋毫”、“自作孽,不可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杀越人于货”、“四体不言而喻”、“绸缪牖户”等七处成语典故的不当翻译,分析了其原因,并提供了作者自己的翻译,总体来说,这些改译的地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谢志超^{[8](152-154)}《超验主义〈日晷〉英译研究的补注》考证和校订了前人对《日晷》中英译《四书》的译文及其研究的一些差误,并做了若干补注,其中涉及到《孟子》英译若干例。1843年,爱默生与梭罗在超验主义喉舌杂志《日晷》开辟专栏介绍世界上主要的文化经典,其中摘录了科利^④翻译的《中国古典著作〈四书〉》,其中有些差误。中国学者钱满素先生的专著《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和陈

长房先生论文集《梭罗与中国》对照和整理了《日晷》上摘录的《四书》语录,不过,编录时出现了把《论语》和《孟子》中语句摘录混淆的问题,如“*When man says, I know well how to draw up an army, I am skilled infighting, he is a great criminal*”出自《孟子·尽心下》:“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钱在《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中译为“故善战者服上刑”,变成出自《孟子·离娄下》了。陈在《梭罗与中国》中,“*When Tsze Loo heard anything that he had not yet fully practiced, he was afraid of hearing anything else.*”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闻。”陈的汉译为“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将之错归为《孟子·公孙丑上》,等等。主要是从英文回译时发生的错误。作者认为马什曼、科利的翻译充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尤其是科利,“站在以‘福音’为唯一并排他的立场和观念上,对《四书》的翻译充满着傲慢无礼、蔑视的态度。特别是在《四书》的注释部分,科利甚至带着宗教上偏见。”作者认为早期的中国古籍西译,由于种种原因,对其考辨研究和准确求解并非易事。这篇文章主要从考据的角度补注了前人回译的疏漏之处,没有具体谈论《孟子》英译的其它方面。

任伟^{[9](139-140)}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发表《大中华文库版〈孟子〉文本外注释研究》,从注释概念厘定出发,研究大中华文库版《孟子》在文本外注释(包括总序、前言部分)存在的问题,重点围绕“语言问题如时态语态、非语言即态度问题打印错误、回译的错误,如 I.A.Richards 的 *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孟子论心多重意义探索》),被回译为 *Exploration of the Multi-meaning of “Mind” Expounded by Mencius*; Kwong Loi Shun 的 *Virtue, Mind and Morality: a Study in Mencian Ethics*(《心性与道德:孟子的伦理学》)被回译为 *Disposition and Morality: Mencius’ Ethics*; E. Faber 的 *The Mind of Mencius or Political Economy Founded upon Moral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encius*, B. C.325(《孟子学说类编》)被回译为 *Different Schools of Mencian Doctrine*,以及引用欠严谨规范等问题展开说明。”作者指出赞助人在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中所起的作用实为双刃剑。强大的赞助人虽然让文库取得阶段性成绩,但也掩盖背后存在的问题。

吴志刚^{[10](147-148)}《准确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译的关键——理雅各英译〈孟子〉指瑕》,主要探讨了理译的“察秋毫”、“自作孽,不可活”、“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杀越人于货”、“四体不言而喻”五处误译,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并与赵甄陶等英译《孟子》版本进行了对照,指出其各自优劣,有两处还提供了作者自己的翻译。

其它的相关文章还有深圳大学王辉、福建师范大学岳峰等学者发表的理雅各研究系列论文或专著,对理雅各英译儒经做了客观翔实的介绍,如王辉^{[11](37-40)}《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等系列论文、岳峰(2004)《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理雅各的翻译思想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加以评价,文中多以《论语》为例,分析其学者型翻译的特色与得失,没有针对《孟子》英译进行研究。

最早的一篇有关《孟子》英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余敏的《从理雅各英译〈孟子〉看散文风格的传译》^[12],该文首先介绍关于文学风格可译性的两种不同观点:文学风格可译,以亚历山大·泰特勒、尤金·奈达及刘重德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差异,文学风格是不可译的。作者认为,如果将散文风格看作一个整体,其风格是可译的,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散文风格可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英汉语言之间有着相似性,这从语音、词汇、句法三个层面得到了论述;此外,英汉两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得散文风格的传译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散文风格的可译性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论文以刘重德的翻译原则“切”为依据,以理雅各英译《孟子》为例,将原文与译文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论证。介绍了作者选择“切”作为风格传译原则的原因是:“切”具有客观性和实用性。《孟子》的风格是正式而且雄辩的。这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三个层面。理雅各都进行了很好的传译。然而,由于英汉语言在以上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因而理雅各对《孟子》风格的传译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作者也举出了例证。作者的结论是“散文风格的可译性是有限的”。

2005 四川大学硕士生任伟的《试论中国译者在汉籍英译中的角色》^[13]一文,主要讨论“中国译者在经典英译中的作用、国外已经有权威译本,中国学者还要不要推出自己的译本?在对外译介中国经典作品时,中国译者究竟要不要参与,如何参与”等颇有现实意义的命题。作者以大中华文库第一辑中的《孟子》为研究对象,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理译、刘译和赵译《孟子》进行比较,讨论译作如何重现文的艺术特色。作者从复译理论出发,以大中华文库《孟子》复译为例,探求其得

与失、复译版本间的关系,以及中国译者汉籍英译复译时应该采取的态度。文章指出大中华文库版《孟子》在注释,包括总序、前言部分存在的问题。认为赞助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为双刃剑。通过分析大中华文库版本《孟子》效果不佳的原因,针对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应该由中国译者来译介中国经典作品的观点,讨论中外译者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中方赞助人参与的意义,指出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更有效的译介中国经典而非由谁来译介。结论是加强中外译者的合作与交流是对外译介取得成功的关键。该文的重点是中国译者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以及回译的必要性等问题,值得引起冷静地思考,作者论证中使用赵甄陶等英译《孟子》作为例证,还将理译、刘译和赵译进行了对比,是第一本比较详细进行多译本对比研究的论文。

2005年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生赵文源的《文化词语的翻译—比较《孟子》的两个英译本》^[14]一文,主要通过对比理译、赵译《孟子》英译本,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探讨《孟子》中文化词语的翻译问题。侧重文化差异层面而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差异,探讨了八种文化翻译词语的方法。作者首先介绍了选取译本的原因,其一、是因为这两译本为国内常见译本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其二、两译本的产生年代相距较为久远,且译者一中一西,语言各有千秋。其次,作者讨论了文化的定义、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文化词语的定义与分类。作者认为“中国文化词语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是汉英翻译实践中必须面对的诸多难题之一。”作者从儒家术语、历史人物、称谓方式、计量单位、动植物名称、物品名称及其他等七个方面,探讨了八种文化词语的翻译方法,认为文化词语的翻译方法应取长补短,综合使用以传达文化词语的内涵。作者还从文化翻译的视角评价两译本的缺憾及其原因。结论是《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文化词汇的汉英翻译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陈琳琳毕业论文《理雅各英译〈孟子〉研究》^[15],该文选取理雅各的《孟子》英译本,依据功能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从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以探求理雅各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之策略及其意义。作者列举了众多实例从词汇、句法、风格三个层面上深入分析理氏译本与原文的对等问题,阐述理想的译作应在内容、形式、结构、风格上反映原文风貌的观点,使译语读者阅读译作时产生与原语读者阅读原作时产生类似的感受。从文化角度探讨了理雅各对于文化因

素的处理技巧,其中主要分析介绍了他的直译加注法,音译加注法和意境译法。结论是:在处理翻译《孟子》此类古典著作时所碰到的文化异质情况时,应在译语语言文化和译作读者所能接受的最大范围内,应用各种翻译技巧尽可能保存其文化形象,同时又不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文章最后通过理雅各的《孟子》英译本和赵甄陶等的《孟子》英译本中的大量实例对比分析了理雅各在词汇、句法、修辞格三个层面上与原文的成功对等,说明虽然有时为追求对等而显得比原文冗长,但总体上理氏译本贴切、自然地再现了原文简洁、凝练、雄辩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与原文相似的效果。作者还探讨了语言、文化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例说明:虽然理译有时仍不可避免地少数文化词汇存在理解不全或误解的问题,他的译作成功地保留了原语文化现象,给译语增添了新的血液,并移除了译语读者的文化阅读障碍。这些翻译策略对于当前的传统中国典籍翻译极具指导意义。全文以理译和赵译作对比,对理雅各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总结,指出其误译之处,还提供了作者自己的译法。

2008年山东大学张静硕士论文,《理雅各〈孟子〉翻译研究》(中文)^[16],作者的专业是历史文献学,作者认为,理雅各作为一位伟大的中国古典文献翻译家,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翻译思想及方法,在研究其译著时,是不应忽略翻译家本身的理论思想的。作者首先总结了前人关于理雅各《孟子》翻译的研究的观点:1、理雅各缺少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因此在译文的翻译上不够传神,也是他的译文出现失真与错误的原因。2、从汉语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理雅各“意合”与“形合”手法在进行《孟子》翻译时的使用。3、从英语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理雅各《孟子》译文在翻译时所体现的功能对等、跨文化交际等原则。然后作者从文献翻译学角度对理译《孟子》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对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与翻译方法进行了全面、详细、清晰的论述、归纳与梳理总结。作者认为“理雅各在翻译《孟子》时,将东西翻译理论、东西宗教思想相融合,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他把传统的儒家释经方法运用到翻译实践中,视其为自己翻译时的标准,主张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平等、互不矛盾,论证了两种思想在济世救人上的一致性,提出了儒、耶互补互学的思想,为中国古籍西译奠定了新的指导思想。”作者把理雅各的翻译思想总结为:1、宗教渗透的翻译表现论反映出理雅各在宗教思想指导下的翻译观;2、济世救民的翻译价值论反映出理雅各对

自身翻译的价值取向及对翻译价值意义的认识;3、东西交流的翻译目的论则反映出理雅各进行翻译的最终目的;4、“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翻译标准,作者还总结了理雅各采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考据法、索隐法、直译法、注释法、意译法、补充法、省略法、对比法、音译法、造词法等。理雅各的译评、译注、前言和索引等方面的成就和创新等。这篇论文的角度比较新,对理雅各的翻译方法的总结也很详尽充实。

三 国内《孟子》研究现状的启示

《孟子》西传以来,比较重要的英译本至少有十五种之多,研究者的范围主要局限于理雅各英译《孟子》,实际上,不少著名汉学家都翻译过《孟子》,如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翟林奈,美国20世纪初“新诗运动”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庞德也深受《孟子》等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些材料为研究《孟子》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多样化的视角,非常值得关注。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译本背后的文化深层次动因,对正确理解《孟子》、勾勒《孟子》一书在西方的流变是很有帮助的。

从目前国内《孟子》英译研究的现状来看:九篇期刊文章除洪涛的两篇将理雅各和刘殿爵的两个版本做比较外,任伟主要对赵译《孟子》文外注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吴志刚把理译《孟子》赵译《孟子》中五句话进行了对比,总体上期论文主要针对理译《孟子》研究,赵译《孟子》和刘译《孟子》作为参照进行了有限的对比,研究并不充分深入;五篇硕士论文有三篇主要针对理雅各英译《孟子》进行研究,陈琳琳在探讨理译《孟子》,将其与赵甄陶等译《孟子》做了简单的比较,任伟的硕士论文对赵译、刘译和理译《孟子》进行了对比,赵文源的硕士论文对赵译、理译《孟子》进行了对比,由此可

见,不论是期刊文章还是硕士学位论文,国内目前关于《孟子》英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译本的研究面太窄,主要是针对理雅各英译《孟子》进行研究,偶见理译《孟子》和刘译、赵译《孟子》进行了对比,因此很有必要,对包括理雅各英译《孟子》等其它十多个英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全面地了解《孟子》一书在英语世界流变的影响与变异,才能更客观公正地对理译《孟子》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第二,多译本研究能为《孟子》英译提供更多样化视角,把英译《孟子》放到更广阔的参照系中去进行比照,必将获得更大的发现;但简单的比较并不是为了作出两种语言层次上的翻译忠实与否的价值判断,停留在对语言学符号转换的技巧性和操作性的层面,当然这样的研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不应该止步于此,其目的是通过还原《孟子》英译的社会文化语境,解读不同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背后的文化动因以及这样的翻译文本对源语国(中国)和目的语国(他国)文化、思想、哲学、诗学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意象的错位、变形、和接受的问题,即对《孟子》英译进行译介学的研究,把翻译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析、评述。第三,多译本研究能从流传学的角度帮助我们勾勒出中国典籍以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作为他者,成为国内《孟子》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和新的研究视角,实现文化的良性互动与交流。第四、经典的英译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努力,精通英、汉语的中国专家,熟悉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孟子哲学思想研究的中国专家、史学家、汉语言文字专家、中外出版社、传播学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才能把典籍英译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做好。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文专述国外学者对《孟子》译介的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参见刘述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2.
- ②参见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4/9732147.html>.
- ③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断句,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2页。
- ④科利,英文名(David Collie, ? -1828),多译作柯大卫,或高大卫,是第一个将《四书》译为英语的人,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
- [1]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杨正典.英文版《四书》译误浅析[J].孔子研究.1992,3.
- [3]秦颖.英译《中国经典》[J].读书,1995,1.
- [4]楚至大.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J].中国翻译,1995,6.
- [5]洪涛.《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J].聊城大学学报,2002,1.
- [6]洪涛.《孟子》辩辞的英译[J].聊城大学学报,2003,3.
- [7]陈琳琳.析论理雅各对《孟子》中些许成语典故的翻译[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3.

(下转40页)

Cognitive Context and Irony Interpretation

LONG De-y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Abstract: Cognitive context is the explanation of formations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Hearers can identify and illustrate irony by the use of cognitive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irony communication cognitive context undertakes both confinement and illustration functions. Its confinement function,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expression forms and choices of meanings, refers to cognitive context's confinement to speakers' use of irony and hearers' understanding of irony. Its illustration func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cognitive context specifies the meanings of the vocabulary and on the basis of cognitive context perceivers can infer irony speakers' intentions by the means of irony.

Key words: Cognitive Context; Irony Communication; Confinement Function; Illustration Function; Intention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6页)

- [8]谢志超.超验主义《日晷》英译研究的补注[J].中国比较文学,2007,2.
 [9]任伟.大中华文库版《孟子》文本外注释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7.
 [10]吴志刚.准确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译的关键——理雅各英译孟子指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5.
 [11]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J].中国翻译,2003,2.
 [12]余敏.从理雅各英译《孟子》看散文风格的传译[D].华中师范大学,2001.
 [13]任伟.试论中国译者在汉籍英译中的角色[D].四川大学,2005.
 [14]赵文源.文化词语的翻译——比较《孟子》的两个英译本[D].中国海洋大学,2005.
 [15]陈琳琳.理雅各英译《孟子》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16]张静.理雅各《孟子》翻译研究[D].山东大学,2008.

A Survey of Translating Mencius into English in a Century

YANG Ying-yu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Abstract: As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 Classic in Ancient China, Mencius had great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before and now.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Mencius into English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it brought abou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ng Mencius into English is far from enough. Therefor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ttract the researcher's attention by a clarified and overall introduction of achievements and findings on translating Mencius into English in publications and M.A. thesis in China. After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researc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research on translating Mencius into English is also presented.

Key words: Translating Mencius into English;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a; Journals; M.A. Thesis

(责任编辑:张俊之)